



20

产业组织评论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eview

第8卷 第4辑 (总第20辑) 2014年12月

Vol. 8 No. 4 (Gen. 20) Dec. 2014

肖兴志 主编

-
- ◆ 陈栋 靳涛 褚敏
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双重影响与效应分析
- ◆ 吉敏 邢天才
衡量银行业竞争度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分析
- ◆ 魏平
银行卡产业纵向关系的合作与竞争研究
- ◆ 钱勇 项毅
服务业产品创新的决定因素分析
- ◆ 涂宗华
煤炭行业征收重税能够改善煤矿安全水平吗?
- ◆ 魏瑾瑞 郑玉薇
高效率的工业企业一定具有核心竞争力吗?
- ◆ 李怀邵慰
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制度分析
- ◆ 蓝天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困境与国际竞争力提升



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工业经济学会

产业组织评论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Review

第8卷 第4辑 (总第20辑) 2014年12月

Vol. 8 No. 4 (Gen. 20) Dec. 2014



肖兴志 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产业组织评论 . 2014 年 . 第 4 辑：总第 20 辑 / 肖兴志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6
ISBN 978 - 7 - 5161 - 6247 - 7

I. ①产… II. ①肖… III. ①产业组织—研究—丛刊
IV. ①F062.9 -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12236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卢小生

责任校对 周昊

责任印制 王超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1.25

插 页 2

字 数 274 千字

定 价 4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顾问

吕政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编

肖兴志

东北财经大学

学术委员会

(按拼音排序)

艾洪德	东北财经大学	陈富良	江西财经大学
陈宏民	上海交通大学	于春晖	上海财经大学
高良谋	东北财经大学	金 碧	中国社会科学院
林 平	香港岭南大学	刘秉镰	南开大学
刘志彪	南京大学	卢东斌	中国人民大学
卢福财	江西财经大学	吕 炜	东北财经大学
戚聿东	首都经贸大学	曲振涛	哈尔滨商业大学
荣朝和	北京交通大学	王俊豪	浙江财经学院
王 讼	东北财经大学	武常岐	北京大学
夏春玉	东北财经大学	夏大慰	上海国家会计学院
于 立	天津财经大学	于良春	山东大学
郁义鸿	复旦大学	原毅军	大连理工大学
臧旭恒	山东大学	张昕竹	中国社会科学院

编辑部主任

吴绪亮

编辑部副主任

窦一杰

目 录

[论 文]

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双重影响与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 1997—2011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 陈 栋 靳 涛 褚 敏 (1)

衡量银行业竞争度的理论方法及其应用分析 吉 敏 邢天才 (20)

银行卡产业纵向关系的合作与竞争研究

——以支付宝与银联之争为例 魏 平 (34)

服务业产品创新的决定因素分析

——基于网络游戏产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研究

..... 钱 勇 项 毅 (49)

煤炭行业征收重税能够改善煤矿安全水平吗?

——基于 VAR 模型的经验研究 涂宗华 (73)

高效率的工业企业一定具有核心竞争力吗?

——基于西部欠发达地区的实证分析 魏瑾瑞 郑玉薇 (85)

中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的制度分析 李 怀 邵 慰 (99)

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优势、困境与国际竞争力提升 蓝 天 (138)

[综 述]

国际贸易核算方法：回顾与展望 刘 冲 (162)

CONTENTS

【RESEARCH PAPER】

- Analysis of the Combined Influences and Effect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Central Government on Industrial Structure Dong CHEN, Tao JIN, Min CHU (1)
- Research on the Theories of how to Measure the Degree of Competition in Banking Industry Min JI, Tian - cai XING (20)
- Research on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of Vertical Relation in Credit Card Industry—A Case Research on the Conflict between AliPay and UnionPay Ping WEI (34)
- Determinants of Product Innovations in Service Industry Yong QIAN, Yi XIANG (49)
- Can higher Tax Burden of Coal Industry Improve the Safety Level of China Coal Mine Zong - hua TU (73)
- Would Efficient Industrial Enterprise Definitely Have the Core Competitiveness? Jin - rui WEI, Yu - wei ZHENG (85)
- Mechanism Analysis of China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uai LI, Wei SHAO (99)
- The Advantages, Predicaments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Improvement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Industry Tian LAN (138)

【REVIEW】

- International Trade Accounting Methods: Review and Future Directions Chong LIU (162)

[论 文]

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对产业结构的双重影响与效应分析 ——基于中国 1997—2011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陈 栋 靳 涛 褚 敏

摘要 中国产业结构失衡在某种程度上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模式有关，但是，这种影响在地域上又有何差异呢？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又会怎么样呢？本文把地方政府作用与中央政府转移支付效果放在同一个框架下来考察，进而揭示两种作用的效果差异和表现。研究发现，地方政府行为不利于产业结构协调，而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却对地区产业结构协调有很好的调节作用，并且发现这两种作用是互补的。研究还发现，东部地区地方政府行为更不利于产业协调，而中央转移支付效果对纠正产业偏离效果更为显著。

关键词 政府主导 转移支付 产业结构 区域差异

一 问题的提出与争论

在传统的财政分权理论中，政府间的财政转移支付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在维持有效的财税体系、解决外部性和收入不均等方面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从而使得中央政府能有效地提供公共物品，保证各地居民享有相对均等的公共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财政分权带来的负面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过去对转移支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实施效果的评价

基金项目：本文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收入倍增计划的实现路径研究”（13&ZD029）、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以政府转型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和谐的传导机制与政策研究”（14YJC79001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既得利益集团影响产业升级的作用机理与实证研究”（2014M561240）资助。

作者简介：陈栋，男，福建漳州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研究生；靳涛，男，山东嘉祥人，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转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房地产经济学；褚敏，女，山东枣庄人，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上，其中较为重要的学术成果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研究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财政体系、地区公用服务均等化程度的影响。曾军平（2000）指出，在试行转移支付的初期，中央政府优先考虑财政的纵向平衡而非横向平衡，因而转移支付对于地区间人均收入差距的调节力度非常有限；尹恒等（2007）运用中国2000多个县级面板数据，证明了转移支付不但没有起到均等县级财力的作用，反而拉大了财政差异，特别是在分税制改革之后造成了近一半的县级财力差异；张恒龙、陈宪（2007）发现不同类型的转移支付对地方政府的财政努力产生的激励作用不同，并且产生的激励作用对于不同区域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别；宋小宁、苑德宇（2008）从政治因素的角度论证了转型期我国中央政府对于地方的转移支付主要是基于维护国家稳定和减少改革阻力的政治平衡考虑，在公共服务均等化上的考虑并不显著。二是研究转移支付对于地方经济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马拴友、于红霞（2003）指出，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不合理，在总体上没有达到缩小地区差距的效果，需要进行结构性的改善；范子英、张军（2010）论证了转移支付尤其是专项转移支付能够显著带来国内市场整合，说明了中央政府能够有效利用转移支付来协调地方政府的行为，使得地区间更好地分工，进而提高市场的规模效应，但是，转移支付仅在短期内对经济增长有正面作用，从长期来看，反而会对经济增长产生消极作用，这使得中国经济发展在平衡中失去了效率。

然而，关于转移支付对产业经济产生影响的研究并不多见。转移支付在地方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给产业结构带来怎样的变化？在中国特色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的支出行为在促进产业结构优化的影响路径上是否一致呢？区域之间又是否存在差异？转移支付能否通过对产业结构的优化来弥补经济平衡发展中失去的效率？这给我们评价转移支付的实施效果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是非常值得探究的问题。

二 转移支付与产业结构变化间的内在逻辑探索

（一）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产业结构的变化特征

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中，配第—克拉克定理告诉我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就业人口会逐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继而向第三产业转移，同时产业结构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变化，即第一产业比重不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先上升、后保持稳定，再持续下降，而第三产业比重则是先略微下降，后基本平稳，再持续上升。在此基础上，许多国外经济学家基于上百个国家的实证案例，得出了经济发展阶段和工业化发展阶段的经验依据，进而得出了“标准结构”，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钱纳里和赛尔奎的方法，他们将经济发展阶段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实现和后工业化三个阶段，其中，工业化实

现阶段又分为初期、中期和后期三个时期，其判断依据主要有人均收入水平、三次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城市化水平等标准（见表1）。

表 1 工业化不同阶段的标志值

基本指标	前工业化阶段（1）	工业化实现阶段			后工业化阶段（5）
		工业化初期（2）	工业化中期（3）	工业化后期（4）	
人均 GDP 2005 年美元（PPP）	748— 1490 美元	1490— 2980 美元	2980— 5960 美元	5960— 11170 美元	11170 美元以上
三次产业产值结构 (产业结构)	A > I	A > 20%， 且 A < I	A < 20%， 且 I > S	A < 10%， 且 I > S	A < 10%， 且 I < S
第一产业就业人员 占比（就业结构）	60% 以上	45%—60%	30%—45%	10%—30%	10% 以下
人口城市化率 (空间结构)	30% 以下	30%—50%	50%—60%	60%—75%	75% 以上

冯飞等（2012）根据此标准得出结论认为，中国的工业化总体处于中期阶段，并处于正在向后期阶段过渡的关口，而日本、韩国实现该过渡的时间点大概在 1973 年和 1995 年。这一工业化发展的进阶变化意味着经济发展的驱动因素将由中期阶段主要依靠资本投入以及廉价劳动力（第一次人口红利）转换到工业化后期、后工业化时期主要依靠技术进步、人力资本上来。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只是根据经验进行分析、量化，既没有对我国区域间的产业结构差异进行分析，也没有将政府行为与工业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揭示出来。日本著名的新制度经济学家青木昌彦（Aoki, 2011）在国际经济学会（IEA）第十六届国际会议上提出，以中国、日本、韩国为典型代表的东亚国家可将其经济发展阶段分为以下五大阶段：M（马尔萨斯式的）阶段、G（中央政府主导型的）阶段、K（库茨涅茨式的）阶段、H（基于人力资本的）阶段和 PD（后人口红利）阶段。青木昌彦将新中国成立后至 1977 年阶段分为 G 阶段，1978—1989 年分为 K 阶段，而 1990—2008 年则为 K 和 H 的混合阶段。在青木昌彦的理论中，产业结构的优化尤其是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变动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重要标志，这与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是相契合的，同时他还指出，在东亚地区经济发展中所特有的集权主义、集体主义、亲缘导向、儒家文化等制度特征及其路径依赖影响下，政府行为往往主导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并在不同的阶段通过影响不同的要素来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对传统的产业结构理论做了重要的补充。

然而笔者认为，中国的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在东亚国家中又有所不

同。在以 GDP 增长为主的晋升锦标赛模式下（周黎安，2007），中国的地方政府对于发展地方经济具有政治和经济上的双重激励，同时在目前实行的分税制财税体制下，发展制造业对于地方政府扩大财力、提高地方政绩具有更加明显的好处，使得地方政府对发展第二产业的热情普遍远超过第三产业。毫无疑问，这一分权化改革视角下的制度特征对于中国经济初期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激励作用，然而，这种特征会给未来的经济发展带来不良的后果：地方政府过度追求第二产业产值的同时往往忽略了第三产业的发展，这对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不利的，尤其是已经处于工业化中、后期的中、东部地区，当人口红利逐渐耗尽（蔡昉，2010），经济发展需要从库兹涅茨式（Kuznets，1957）的 K 阶段向依靠人力资本发展的 H 阶段转变时，产业结构的畸形、扭曲甚至失衡往往会成为经济继续发展、跨越的桎梏，使得经济体在“陷阱”中泥足深陷（蔡昉，2011）。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分税制改革以来的省级面板数据来看，中国区域间的产业结构确实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以江苏、浙江、广东为首的东部沿海省份大部分进入了工业化后期，而北京、上海作为国际化大都市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阶段，开始出现郊区化和逆城市化现象；中部省份如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处于工业化中到后期的过渡阶段；而西部省份则参差不齐，如新疆、青海等偏远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初期，而四川、重庆等省份处于工业化前期到中期的过渡阶段。笔者发现，除北京、上海两地由于其政治、经济的特殊性导致第三产业略高于第二产业外，东部大多数省份并没有呈现典型的工业化后期中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第三产业发展逐渐赶超第二产业的现象，而是与中部绝大部分省份以及西部的内蒙古、四川、重庆等省份一样，产业结构呈现第一产业比例逐渐下降，第二产业以大于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逐渐上升的趋势，这与中国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下的产业结构变化特点是相一致的。

基于上面的分析，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具有典型的东亚发展模式的国家，在路径依赖下，政府行为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会更强和更持续，这样可得出：

推论一：中国政府主导模式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力更为深远和长久，从短期来看，对经济发展起到巨大的激励作用，但是，对于产业结构的高级化、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却是不利的，若不从体制内部进行变革，在这种模式下想要转变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实现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突破将更为困难，因为各级政府和利益集团的阻碍会更为强烈。

而基于各区域的工业化进程阶段的不同，又可以推断出：

推论二：在工业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和中部地区，单纯以 GDP 为导向的政府行为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变是不利的，这将使得在经济发展和产业发展的后期政府主导模式的效率大打折扣；而在处于经济发展较低阶段的西部地区，尽管政府的主导行为可能使得产业发展倾向于制造业，但这是经济体在工业化起步中必经的阶段。

(二) 分税制下转移支付的历史沿革变化以及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分析

中国现行的转移支付制度是在 1994 年分税制改革的基础上形成的。分税制改革明确划分了不同层级政府的税种和分享比例，其中，较多收入的税种如增值税、消费税归中央或中央占有大部分比例，中央企业或大型国有企业的所得税也归中央政府所有，而课税成本较高的小税种以及地方企业的所得税等归地方政府所有。分税制的实施极大地提高中央政府在整个预算收入中的比重和整个预算收入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而财政的支出方面仍然保留了改革前的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支出责任体制，即地方政府扮演着中央政府的支出代理人的角色，因此，改革后地方政府相对中央政府的支出比例大幅度提高了（张军，2007）。这种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不匹配相当大一部分要通过转移支付中的税收返还这一项来解决。如图 1 所示，在分税制改革之后、1999 年以前税收返还占转移支付的比例一直在 50% 以上，这也说明了在早期的转移支付更多的是作为中央争取地方政府支持财政改革的一种妥协政策，倾向于保护各地区的既得财政利益，而对于地方的均等化转移支付较为有限，因此，早期的财政转移支付并未有效地缩小地区间财力差距（贾康、白景明，2002；Tsui, 2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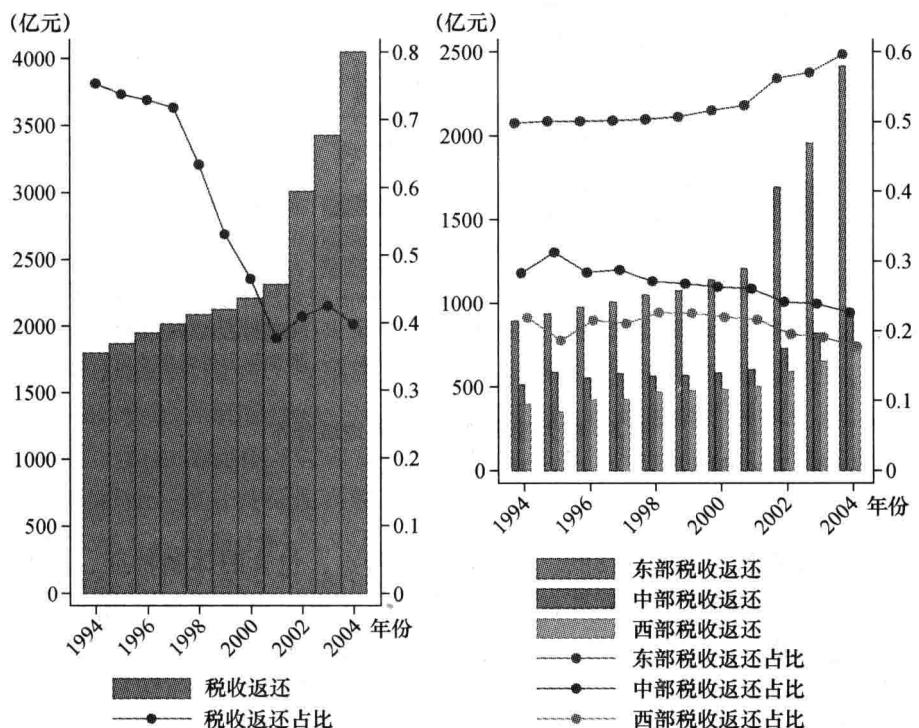


图 1 税收返还及其地域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及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转移支付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以及专项转移支付。其中，财力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提高地方的财力以实现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旨在解决横向财政的不均衡，它与有利于实现财政纵向均衡的税收返还形成互补，两者都属于无条件转移支付。财力性转移支付在1999年之前的变化并不大，而在1999年之后保持上升趋势（见图2），并且伴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等战略的提出进行了结构调整，将其中的大部分拨给了中、西部的相对不发达地区，这使得财力性转移支付的均等化效果大幅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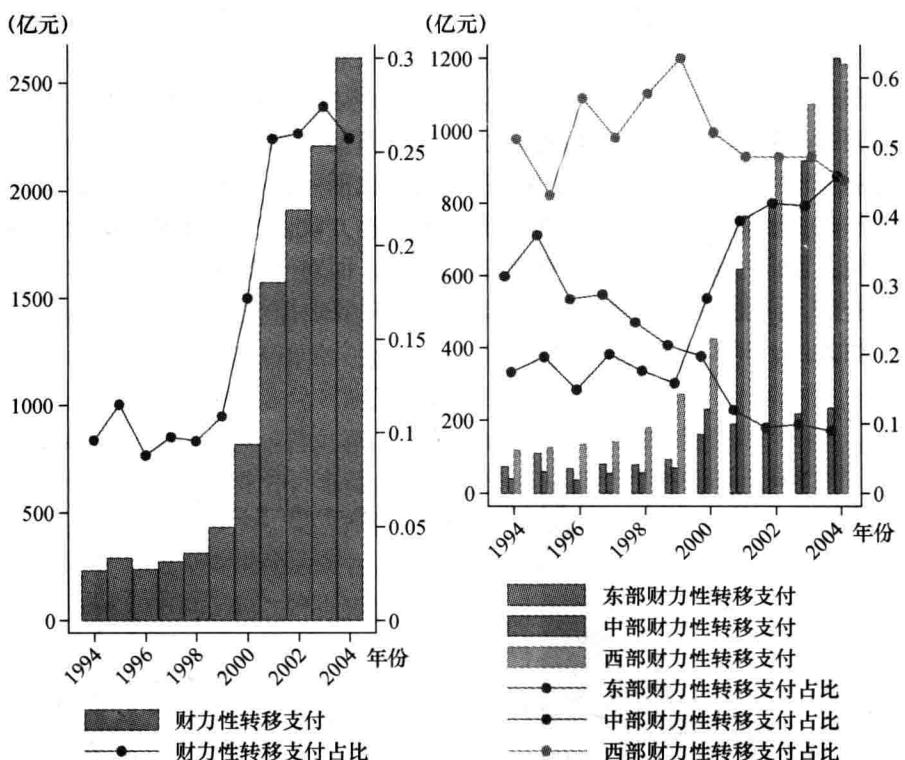


图2 财力性转移支付及其地域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及《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相对前两者的透明度较低、随意性大等特点，包含旧体制特征、以专项补助为主的专项转移支付更具有政策导向性，它由中央政府指定用途，往往要求地方配套一部分资金以实现专门项目的实施，若配套得当，同样可有效实现均等化目标（张恒龙、葛骅，2012）。如图3所示，专项转移支付自分税制改革以来持续增长，已逐渐成为转移支付中最重要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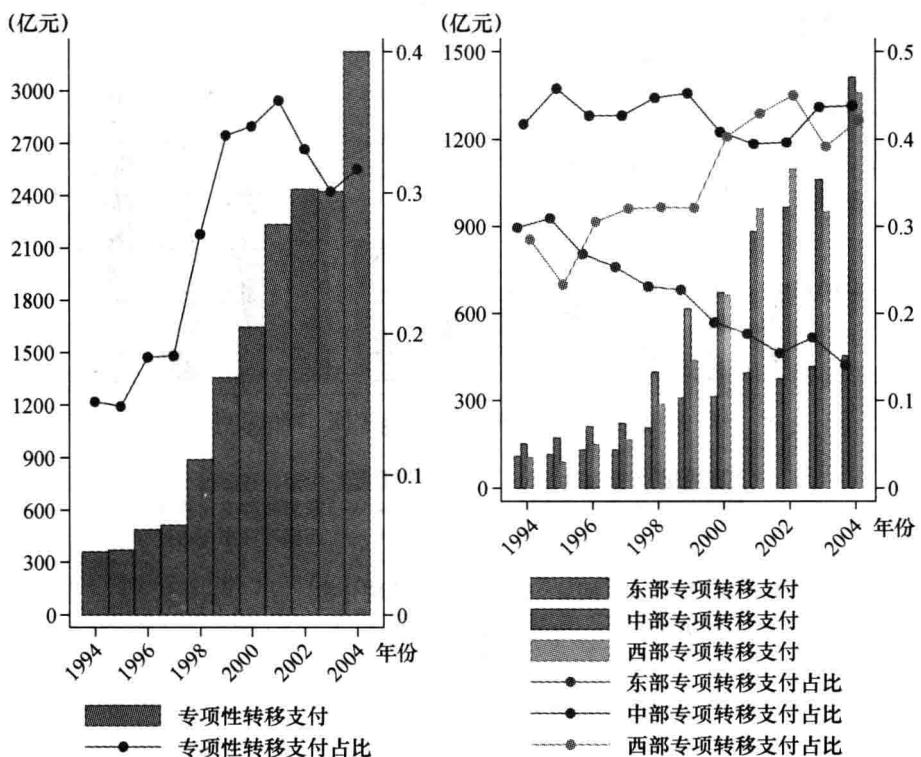


图3 专项转移支付及其地域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及《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观察到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的转移支付政策一改早期的具有妥协政策的特征，逐渐提高了对于中、西部地区的支持力度（见图 4）。这不仅表现为中央政府降低了税收返还在转移支付中的比重，更体现在财力性转移支付、专项转移支付比重的增加以及这两者对于中、西部地区支持力度的大幅度倾斜上（见图 1 至图 3），从而形成了税收返还以东部地区为主、财力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以中、西部地区为主并且不断增加的结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转移支付更加注重区域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作用，加大地方政府对于科教文卫、医疗、社会保障等领域的支出，这在逻辑上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时的偏好性是相逆向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到：

推论三：中央对地方的转移支付与地方政府本身的主导行为对于产业结构的作用是反向的，能够促进第二、第三产业的协同发展，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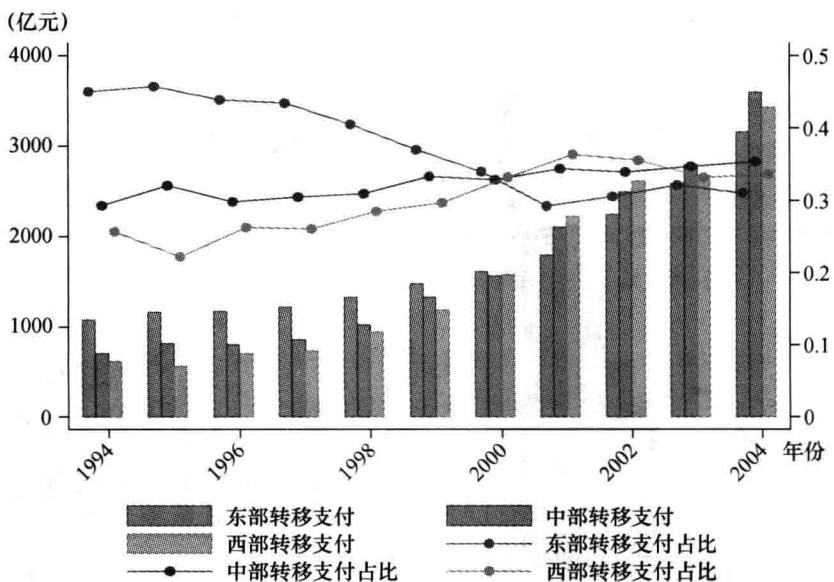


图4 转移支付的地域分布

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及《地方财政统计资料》。

三 实证研究

(一) 计量模型的设定

本文的研究重点是考察转移支付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其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行为对于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是否相悖以及区域间是否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在前文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构建了本文的计量模型：

$$CO_i = \alpha_0 + \alpha_1 TRAN_i + \alpha_2 GOV_i + \alpha_3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其中， i 表示地区， t 表示年份， CO 表示度量产业结构协调发展的程度， $TRAN$ 表示中央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水平， GOV 表示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能力， α_i 表示个体的固定效应， ε_i 表示随机误差项。此外，为了得到更准确的估计结果，我们还采用了一系列表征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要素禀赋和制度环境的控制变量，用向量组 X_i 表示。

(二) 指标的度量以及数据说明

本文采用1997—2011年全国29个省份（台湾、西藏除外）的面板数据，考虑到区域间产业结构的差异性将其分为东部（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中部（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南、湖北）和西部（内蒙古、广西、四川、重庆、贵

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数据基本来自《新中国 60 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国财政年鉴》以及地方统计年鉴。模型中采用的指标如下所示：

1. 被解释变量

被解释变量 CO 指标为尝试使用的产业协调度指标，其表达式为第二、第三产业产值 I 、 S 的比值与 1 的偏离度的绝对值，如(2)式所示，由于大部分省份的第二产业都超过了第三产业，我们将制造业产值作分子，服务业产值作分母。前文论述过，在工业化进程中，第二、第三产业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尤其重要的指标，通过协调度指标的变化，我们可以知道，第二、第三产业之间是否处于协同发展中，当制造业发展速度超过服务业时该指标将上升，而当两者协同发展时协调度则有减少的趋势（最小为 0）。

$$CO = \left| \frac{I}{S} - 1 \right| \quad (2)$$

2. 核心解释变量

(1) 转移支付水平 ($TRAN$)：用(各地方政府获得的中央补助收入 - 上解支出的差额)/当地 GDP 来测量，以此观测转移支付是否对产业结构的协调发展起到正面作用。

(2) 地方政府的主导行为 (GOV)：用各地区的财政支出占当地 GDP 的比重来表征地方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从而考察政府在地方经济发展中的主导能力。

3. 控制变量

为了更好地检验转移支付以及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产业结构的作用机制，我们引入了资本存量、就业人口数用来表征经济发展中的要素禀赋以及金融发展程度、经济开放程度、市场化指数用来表征经济发展中的制度因素。

(1) 资本存量 (K)：该数据采用孙辉等(2010)对中国各省资本存量的估计数据，并使用了相同的方法和指标补齐了 2009—2011 年的数据，为可比价。

(2) 就业人口数 (L)。

(3) 金融发展程度 (FD)：用信贷规模占当地 GDP 的比重表示，这一指标反映了地区信贷政策的偏向性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影响。

(4) 经济开放程度 ($OPEN$)：用出口贸易额在 GDP 中的比重表示，这一指标反映了地区经济对外开发程度对于地区经济发展方向的影响。

(5) 市场化指数 ($MARKET$)：该数据采用樊纲、王小鲁、朱恒鹏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更新至 2009 年)，并通过计算近三年平均增长率的方法将其补齐至 2011 年。

以上所有变量的统计描述如表 2 所示。

表 2 主要变量统计描述

变量	观察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O	435	0.2934	0.3210	0.0004	2.2947
TRAN	435	0.0880	0.0656	0.0183	0.4864
GOV	435	0.1594	0.0728	0.0531	0.5792
K	435	0.4136	0.4283	0.0169	2.9376
L	435	2.4380	1.5690	0.2548	6.4856
FD	435	1.0367	0.3196	0.5372	2.5847
OPEN	435	0.1622	0.1951	0.0148	0.9053
MARKET	435	6.0202	2.2540	1.29	12.8052

(三) 计量结果及分析

表3列示了对于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1)、模型(2)、模型(3)分别为混合效应、面板固定效应、面板随机效应下的OLS估计结果。从表中可以看出，面板模型设定的F检验表明，个体效应十分显著，即混合OLS的估计结果是有偏的，Breusch-Pagan LM检验说明随机效应模型比混合OLS更合适，而Hausman检验的结果进一步在1%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FE和RE估计结果无系统性误差的原假设，从而说明了固定效应模型相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因此，我们主要对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的回归结果进行分析，如表3所示，地方政府的主导行为对于产业协调度具有正向影响，并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政府的干预使得地方经济的发展更倾向于制造业，阻碍了产业结构的高级化，支持了推论一。

表 3 全国样本的回归结果

估计方法	OLS 估计			IV 估计
	POOLED (1)	FE (2)	RE (3)	2SLS (4)
模型				
TRAN	-3.20 *** (-3.57)	-5.24 *** (-6.70)	-5.05 *** (-6.61)	-10.31 *** (-3.32)
GOV	2.21 *** (2.79)	5.09 *** (7.64)	4.81 *** (7.30)	7.76 *** (3.41)
K	0.08 (1.47)	-0.16 *** (-3.29)	-0.13 *** (-3.16)	-0.19 ** (-1.99)
L	0.01 (0.82)	0.05 (0.88)	0.03 (0.70)	0.05 (0.26)

续表

估计方法	OLS 估计			IV 估计
	POOLED (1)	FE (2)	RE (3)	2SLS (4)
FD	0.32 *** (5.47)	0.39 *** (3.63)	0.34 *** (2.70)	0.43 *** (5.08)
OPEN	0.66 *** (6.58)	0.63 *** (4.50)	0.54 *** (4.26)	0.45 *** (2.62)
MARKET	0.04 *** (3.45)	0.05 *** (4.74)	0.05 *** (4.94)	0.15 *** (4.47)
常数项	-0.30 *** (-3.46)	-0.087 (-0.68)	-0.07 (-0.76)	-0.60 *** (-3.75)
R ²	0.2761	0.3537	0.3498	0.3537
面板设定 F 统计量		37.37 *** [0.0000]		
Breusch - Pagan LM 检验			1004.12 *** [0.0000]	
Hausman 值			26.41 *** [0.0000]	
D-W-H 内生性检验				345.60 *** [0.0000]
Anderson LM 统计量				23.928 *** [0.0000]
Cragg - 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4.25 **
Anderson - Rubin Wald 统计量				41.79 *** [0.0000]
Sargan - Hansen 检验				4.00 [0.1351]

注：①（ ）内数值为回归系数的 t 检验值， [] 内数值为检验值对应的 p 值， * 、 * * 、 * * * 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0% 、 5% 和 1% 的置信水平下显著。② POOLED 表示混合 OLS 模型， FE 和 RE 分别表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的面板模型，面板设定 F 检验的原假设是个体效应不显著，即使用混合 OLS 模型与面板模型的估计结果是一致的， Breusch - Pagan LM 检验的原假设是误差项独立同分布，若拒绝则说明存在随机效应， Hausman 检验的原假设是 FE 和 RE 检验的估计系数不存在系统性差异，即选择随机效应模型效果更好。③ D-W-H 内生性检验的原假设是回归元为外生的，若拒绝则说明回归元存在内生性问题。④ Anderson LM 检验的原假设是存在识别不足问题，若拒绝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⑤ Cragg - Donald Wald F 检验的原假设是工具变量为弱识别，当 F 统计量大于 5% 显著性水平的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⑥ Anderson - Rubin Wald 检验的原假设是内生回归元的系数联合不显著，若拒绝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⑦ Sargan - Hansen 检验的原假设是工具变量为过度识别，若接受原假设说明工具变量是合理的。